

泉州

華僑華人研究

李天錫 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泉州

華僑華人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州华侨华人研究/李天锡 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9

ISBN 7-5073-1730-7

I. 泉… II. 李… III. 华侨华人-研究-泉州-中国

IV. D6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723 号

泉州华侨华人研究

作 者: 李天锡

责任编辑: 庆 铭

封面设计: 杨孙超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1/32 14.5 印张 35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073-1730-7/G·242

定价: 平装本 32.00 元 精装本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泉州市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现辖有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待统一的金门县。泉州是福建、也是中国的著名侨乡,以其独特的风姿为世界所瞩目。我能够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不能不说是今生的一大幸事!

泉州还是我国首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它以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子民。我孩提时代就曾经无数次地被优美悲怆的姑嫂塔传说,被先民跨洋过海艰苦奋斗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所震撼,所感动。自小喜欢追根寻底的我,曾为此而惊叹不已,也曾为此而苦思冥想。平心而论,20 多年前当我即将步出校门时,放弃了

留在省城步上仕途的追求,回到了生我育我的“摇篮血迹”之地,并且选择了以华侨华人研究为终生职业,不能不说其中有着孩提时代所形成的这种积淀的潜移默化的发酵作用。

泉州籍华侨华人约达 600 多万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同所有海外华侨华人一样,四海为家,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推动了住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为祖籍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华侨历史研究热潮在中华大地的兴起,泉州华侨华人问题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980 年 11 月,泉州有关部门配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晋江地区(即现‘泉州市’)华侨历史讨论会”。1981 年,成立了“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1987 年 4 月正式成立“泉州华侨历史学会”。自此以来,该会先后编辑出版了会刊《华侨史》(1982 年出版的第一辑称《侨史》)8 辑,约达 100 多万字。在此期间,泉州市(即现“鲤城区”、“丰泽区”等)侨联也于 1984、1985 年先后出版了两辑《泉州华侨史料》。泉州市与下属各市、县、区政协所编辑出版的有关《文史资料》及省内外一些其它书籍报刊也都发表过一些有关文章。20 世纪 90 年代,泉州市及下属各市、县、区出版的地方志书中都设有《华侨》一卷,并且先后出版了《泉州市华侨志》、《晋江华侨志》、《南安华侨志》、《安溪华侨志》、《惠安华侨志》等。此外,有关部门还先后举办过“李子芳诞辰 8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李清泉学术讨论会”、“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泉州华侨与抗日战争历史讨论会”、“江南华侨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与“泉州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等,并且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有关论文集。1993 年,泉州市侨联在海内外乡亲的积极支持下,正式创建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进行华侨历史资料、文物的搜集、陈列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有助于人们对泉州华



侨华人历史的了解。这一切,无疑都为泉州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泉州华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因此,对泉州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决不是在某一时间段就能够全部完成的,而是留有一些未曾被注意的问题尚有待于我们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以来,即有意识地立足于泉州侨乡,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基地,尽力挖掘出其深层的底蕴。泉州,确实也给了我丰富的素材和学术的灵感。我的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方向即缘发于此。我关于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课题的确定,最初也是受到泉州——这一“宗教博物馆”的启迪。由是,经过 20 多年的日积月累,我搜集积累了不少有关泉州华侨华人的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我认真地进行分析和思考,并就其中某些问题撰写文章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或在有关刊物发表。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被搁在一边。因此,如何很好地运用这些资料,便成了我心中的一种期待。

记得一位前辈在谈到泉州华侨历史研究的情况时这样说过:“近年来泉州侨史工作者注意地方性资料、文物的搜集整理,认识到地方性资料是最基本、最生动、最真实、最有地方特色的第一手材料,对全国侨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方圆:《古城侨史绽新蕾——泉州侨史研究概述》,载《泉州文史资料》新三辑)我甚为赞同这种观点。因此,为了不让这些资料长期束之高阁,自 2004 年 9 月开始,我即利用课余时间,集中精力,把自己 20 多年来所搜集到的有关泉州华侨华人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综合、研究,全面考虑,系统布局,并参考前人的有关成果,撰写成这一本《泉州华侨华人研究》,交付出版。这是我对从事泉州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一个小结,也是向多年来支持、关



心、鼓励我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父老乡亲的一个汇报。此外,我也希望它能够有助于把华侨华人(尤其是泉州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引向深入。当然,它如果能够对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有一点助益,那更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宋元时代泉州华侨出国	1
第一节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与华侨出国	2
第二节 晋江安南两国王	9
第三节 董柳轩开族吕宋大明街	20
注 释	29
第二章 明清至民国时期泉州华侨出国	32
第一节 出国的基本情况	32
第二节 出国原因	46
注 释	61
第三章 泉州华侨的不幸遭遇	63
第一节 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期	64
第二节 菲律宾独立战争期间	69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期间	73
第四节 华侨的苦难生活	83
注 释	86
第四章 安海华侨的特点	88

第一节	由海商而成为华侨	89
第二节	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94
注 释		100
第五章	石狮华侨华人与石狮商工文化	103
第一节	石狮商业文化的形成	104
第二节	石狮华侨出国与商业文化传播	107
第三节	石狮华侨华人商工文化回传	112
注 释		116
第六章	崇武华侨与惠安石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119
第一节	崇武华侨出国原因及其职业构成	120
第二节	惠安石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130
注 释		141
第七章	安溪华侨出国与茶叶外销	144
第一节	早期华侨出国情况分析	145
第二节	《峴阳开闾王氏族谱》资料分析	149
第三节	安溪茶业的海外经营	156
注 释		160
第八章	永春华侨出国及其作用	162
第一节	华侨出国	162
第二节	开发侨居地的贡献	169
第三节	支援祖国革命事业	176
注 释		180
第九章	德化华侨出国及其对革命的贡献	184
第一节	华侨出国	185
第二节	对祖国革命的贡献	191

第三节	参与侨居国反侵略战争	195
注 释		197
第十章	鲤城华侨华人与祖国革命和建设	199
第一节	印尼、菲律宾的鲤城华侨	200
第二节	支援祖国革命	205
第三节	兴办故乡教育福利事业	214
注 释		218
第十一章	百崎郭氏、陈埭丁氏回族华侨华人	222
第一节	百崎郭氏华侨的形成和发展	223
第二节	陈埭丁氏华侨的爱国爱乡传统及其展望	232
注 释		243
第十二章	晋江侨办教育的历程及其作用	245
第一节	历程	246
第二节	作用	256
注 释		262
第十三章	苏得道从苏禄引进番薯	264
第一节	史籍的有关记载	265
第二节	详情考证	268
第三节	鲜为人知的原因	274
注 释		275
第十四章	明清时代琉球的泉州华侨及其对	
	中华文化的传播	277
第一节	琉球华侨的构成	278
第二节	传播中华文化	283
注 释		285

第十五章 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及其成功背景	288
第一节 企业经营管理方式	288
第二节 成功背景	296
注 释	303
第十六章 泉州华侨华人与菲华文学	305
第一节 抗日战争前后	305
第二节 五十年代后的曲折发展	321
第三节 柯清淡作品的故国情结	336
注 释	344
第十七章 泉州华侨华人与海外中国民间信仰	348
第一节 传播妈祖信仰	349
第二节 泉州民间信仰传播印尼	355
注 释	365
第十八章 泉州侨批业始末	368
第一节 侨批业萌芽	369
第二节 水客时代	371
第三节 批信局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375
第四节 侨批业的改造与消亡	388
注 释	394
第十九章 泉州归侨知识分子的贡献	397
第一节 情况分析	398
第二节 主要贡献	401
第三节 动因探究	413
注 释	415

主要参考书目	418
附录一：商誉善举播菲国	
——记菲律宾华人企业家慈善家李逢梧先生	422
附录二：浓浓乡情怀银江	
——记菲华侨领李沧洲先生	429
附录三：塑胶巨擘 体坛领袖	
——访旅菲永宁中学校友会荣誉会长、 校董会董事陈著远先生	432
附录四：老而弥坚 笔耕不辍	
——记菲华老报人李贤达先生	435
后 记	439



第一章

宋元时代泉州华侨出国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为晋江下游的东海之滨,即江海交会之区。泉州港是泉州东南晋江下游滨海的港湾,其范围除泉州湾外,还包括深沪湾、安平港和围头澳。泉州湾扼晋江下游,水陆交通方便,水道深邃,港湾曲折,是一个天然良港。

唐代,泉州已经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与交州、广州、扬州被并称为我国南方贸易大港。^[1]唐末五代,渐趋活跃。进入北宋时期,来这里的外国商舶日益增多。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各国贸易,因而泉州港在海外交通贸易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贸易的需要,北宋政府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



设置了提举市舶司(简称“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无疑是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的反映;而通过设置泉州市舶司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随着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泉州人民移居国外者也不断增多。

第一节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与华侨出国

一、泉州市舶司的设置

宋代,市舶司的任务是“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2]具体地说,其主要职责就是办理船舶出海的许可证和征税(即“抽鲜”)。其时市舶的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高宗赵构曾经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3]因此,统治阶级非常注意加强对市舶司的管理,“熙宁(1068—1077年)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4]根据陈瓘这一段文字的叙述,可知在宋熙宁年间,泉州前往海外贸易的船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才能出海;回国之时,又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鲜,否则就要被“没其货”。这必然会给泉州海商带来诸多不便。比如,到南海贸易,由泉州启航,若乘风便,一般可冬发夏归。现在则必须在冬天乘北风到广州,于过冬之后的第二年冬天才能去南海,第三年方可返国,需多费二年之久。以到高丽贸易而言,若趁季风,由泉州出发,一般当年可以往返;现在则得先南下广州,再由广州北上,就耽搁了许多时间,因而“费重利薄”,^[5]海商的积极性大受打击。同时,泉、广之间海道多有“焦石浅沙”,^[6]海商也不愿意冒这种风险。以致“舟之南日少(按:即前往广州的船舶日益减少),而



广之课岁亏(按:即广州的市舶收入一年一年亏损)”,^[7]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这也许就是促使北宋政府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一个因素。

泉州市舶司设置以后,泉州港的对外贸易日益繁盛,一跃而凌架于广州之上,成为全国的最大贸易港。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成书的《云麓漫钞》,即明确列举“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遍及30国。20年之后,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赵汝适的《诸番志》则列举了57国,均以泉州作为计算里程的起点,其范围东起菲律宾群岛,西抵非洲东岸,北至日本和朝鲜,包括了整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区域,可见当时前来泉州港贸易的国家之多和地区之广。同时,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那种船舶往返均要先经过广州市舶司的烦琐状况,于是“舟之南日少”的泉州海商又重新活跃起来了。据《高丽史》载:泉州市舶司设置后的第四年(即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三月,即有“宋商徐成等一百五十人来献土物”。^[8]据苏轼在元祐五年八月所写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云:“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9]我们可知徐成乃泉州海商。自此而后,至北宋灭亡,《高丽史》中有关中国商人前往贸易的记载不下20起,但都泛称“宋商”。笔者以为,其中泉州海商必定占有不小比例。因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港开始向全国之最大贸易港迈进,那么由泉州港前往贸易之商人被称为“宋商”,自在情理之中,以上关于“徐成”之记载即是明证。苏轼曾经说过:“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戡者甚众”。^[10]这说明福建海商垄断了对高丽的海上交通贸易,而福建商人必定是以泉州一带的闽南商人为主。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即称徐戡为“泉州百姓”,说他“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1]其时,还有不少人前往日本贸易,但仍多泛称“宋



商”。目前见诸史籍的还有泉州著名海商李充。他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前往日本贸易,三年(1104年)归国,四年(1105年)八月又再度前往日本大宰府,并且呈递了“公凭”,请求贸易。^[12]李充第二次渡日贸易的档案材料被收藏在日本大宰府,是研究日中贸易的珍贵资料。当时前往其他地方贸易者可能还有不少,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进入南宋以后,泉州商人的海外贸易更是繁盛,贸易范围也不断扩大。仍以前往高丽贸易为例: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至二十二年(1152年),史籍记载前往高丽的宋商就达16起之多,人数共1332名,最多的一起达330名。“往常泉州、明州的海商往高丽贸易者就占多数,现在这个时期《高丽史》虽未标明商人来自何方,但仍然可以肯定以泉州海商为代表的福建商人仍在多数之列。”^[13]当时从泉州港出国贸易者,不仅有泉州一带商人,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成书于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的《梦粱录》称:“若欲泛舟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14]可见当时泉州港是非常兴盛发达的。

南宋,泉州一带兴建了不少规模宏伟的建筑。例如,绍兴年间(1131—1162年)石狮宝盖山上建造了关锁塔(又称“姑嫂塔”);绍兴八年(1138年)安海始建安平桥(又称“五里桥”);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现称“鲤城区”)建筑了天后宫。这三座古建筑都与海外贸易有一定联系。比如,关锁塔可为“商舶自海还者,指为抵岸之期”;^[15]安平桥可使中外商船直接停泊,并可在桥边码头装卸货物,方便水陆转运;天后宫即奉祀海神——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出洋贾舶之人大多前往焚香膜拜,祈求庇佑他们海上安全。因此,可以说这三座古建筑的兴建,是市舶司设置之后的南宋时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的象征。这三座古建筑都集中在泉州一带,有关传说(如姑嫂塔的传说)也在泉州一带流传(后来也流传到闽南及东南亚地区),这种情况在其它地



方是不多见的。结合泉州的地理位置及当时泉州一带人民的职业结构等情况来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其时从泉州港出洋到国外贸易者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但必定是以泉州海商为代表的闽南商人为主体的。

二、泉州华侨出国

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谈》中写道:“汉威令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可见我国在唐代形成的早期华侨,是由于前往海外经商“住番”而成的。宋代,我国的海外交通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住蕃”者肯定是会随之增加的。随着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流寓海外的华侨必然也会不断增多。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些碑文佐证了这一史实。1972年,在文莱穆斯林公墓中发现了一方墓碑石,高38.5英寸,宽16英寸,厚4—4.5英寸。碑文写道:“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这是为官“判院”的蒲公死于文莱的实物资料,然而他是否华侨,难以确断。但其子“应甲”于“景定甲子”(1264年)为其在文莱立墓碑,可知至少其子应甲确为华侨无疑。莆田祥应庙碑记载:“……泉州网首朱纺舟往三佛齐,亦请神之香火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归德于神。”从朱纺前往三佛齐(即“印尼”)经商“不期年”而“获利百倍”,可反证逾一、二年或更久未归者当也为数不少,他们也是应该算为华侨的。该碑刻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也是在泉州市舶司设置之后,可见其时出国侨居者不少。

高丽(即“朝鲜”与“韩国”)是当时泉州海商频繁活动的一个国家。据《高丽史》载,北宋往高丽者不下百起。有标明籍贯